

第三章 贊助者的需求與品味

《豐饒時節》於 15 世紀初開始繪製，當時法國歷經 1338 年起英法百年戰爭、數起鼠疫肆虐，和多次慘敗戰役（例如：1356 年，法軍在 Poitiers 戰敗；1415 年，Agincourt 之役，法軍潰不成軍）不久，人口銳減、飢荒蔓延，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時空背景中。¹由當時家庭人口普查資料得知，1328 年法國人口總數約為 1800 萬人，黑死病卻使人口驟減 1/4 至 1/3 之多。²1350 至 1450 年間，人口銳減使得存活下來的農民與宗法家族可支配大片空地，他們致力於發明或改良農具或耕種技術，以開發土地資源，滿足物質需求，市民(burgher)的經濟與政治力量逐漸抬頭。³

軍事潰敗與民生凋弊，對 1328 年起由菲利普六世(Philip VI, 1293-1350)所引導的法洛瓦王朝(Valois)新政權而言，其權威及正統性無疑受到極大的挑戰與打擊。特別是當 1336 年英王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挪用法蘭西王號與家徽，同時供奉與法國相同的守護神—聖 路易(St. Louis, 1214-1270))時，法洛瓦王室勢必要採取具體行動，在人民心中建構另一政治神話，以鞏固合法性危機四伏的新政權。在此同時，羅馬教皇遷至亞維農，造成 1378-1439 年間，天主教教皇權分裂，使得當時宗教權威也出現分崩瓦解的局面。對承繼拉丁基督教正統的法國而言，他們自認是所有基督教王國中最優秀、最虔誠的聖地。聖人的英雄事蹟足以燃起人民對法蘭西的愛國情操，從聖 德尼(Saint Denis)、聖 克羅維(Saint Clovis)、聖 路易(Saint Louis)、大天使(Saint Michael)等守護神，大量出現在神蹟記載、教宗刺令、國王祈禱書及法國史中即可說明，這些守護神已然成為法蘭西的國家象徵，

¹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 -XVIII^e Siècle. Tome I: Les Structures du Quotidien: Les Possible et L' Impossible*(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79) 中譯本為費爾南 布勞岱爾著，施康強和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共三冊，1999 年），pp. 10-19.

² Colette Beaune, *The Birth of an Ideology*(Berkeley, L. A.,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6.

³ Braudel, *op. cit.*, pp. 31-66.

乃法蘭西與上帝之中介者，宣示著法國等同於天主教會，法王為上帝世間代理人的意識型態，以強化法王政權的正統性。⁴自中世紀起，神聖性乃唯一認同的根源，法國亦深植於此宗教傳統，然而此時宗教與政治實體結合的傾向，彰顯出法國歌德晚期，宗教的神聖性與超越性已逐漸轉入世俗，始具國家主義的時代徵象。

此外，當時王僕與臣民公開為國王祈禱的場合相當多，大凡國王加冕、結婚、誕生、出殯、戰勝、疾病、進城等，皆須進行公共祈禱儀式，許多公爵生日乃聖人節日，等於間接為王室祈禱。14世紀下半葉，教宗克雷蒙五世(Clement V)甚至對外宣稱，為王室罹病成員祈禱，促其進入天國者，可獲40天贖罪券及教宗特赦。⁵這種鼓勵信眾為國王個人祈禱的行動背後，實存在集國家與宗教權力於法王一身的政治意圖，以增強國王的天賦神權與人民的國家意識。

除了守護神與祈禱外，法國中世紀末的國家圖像又以三葉瓣百合花(fleur-de-lys)、白色十字架和長翅馴鹿，在民間最為普遍認同。對少數有學養之士而言，特洛伊戰爭、舍拉法(Salic Law)、法國方言和「天堂花園」(Garden of Paradise)等，更帶有強烈的國家意涵，象徵法蘭西王國的起源或疆界。⁶上述圖像主題可見於許多王室贊助的兵器、印鑑、錢幣、手抄繪本、織毯中，亦出現在《豐饒時節》內，足以見得貝利公爵身為王室要角，自然也善於借用文字和圖像，彰顯皇家正統與人文素養的王室習慣。

在歷經政局動盪和民生困頓後，十四世紀下半葉的法國社會與文化逐漸復甦，王室所珍藏的文物，品質之精、質量之多，堪稱與義大利羅馬教庭及麥迪奇家族的藝術品相互抗衡。然而，兩者在委託物的種類和風格上，呈現截然不同的特性。前者以材質華貴、做工繁複的精巧珍品為主，諸如：珠寶、金工、織毯、手抄繪本，展現出優雅、柔美的國際歌德風格；後者則以規模宏偉的壁畫、祭壇畫和聖人及墳墓雕像為主。當時法國城堡的設計也逐漸排除純功能性的防禦工

⁴ Beaune, *ibid.*, pp. 13-196.

⁵ Beaune, *ibid.*, pp. 13-19.

⁶ Beaune, *ibid.*, p. 9.

事，增添高聳尖塔、大型高窗和鐘樓等裝飾性建築元素，顯示出宮廷在日趨重視實用物品的視覺美感之同時，也不忘保存媒材本身的經濟價值，以備不時之需。無關乎物質生活的藝術贊助活動，更顯得奢侈、罕見與特權，其目的不僅止根於貴族個人的文化雅趣，更具有炫耀王室貴族財富與地位的具體功能，無形中擴大、鞏固平民和上層貴族之間的階級鴻溝，強化原本以血源區分階級的深層社會結構。⁷就費時費工、用材貴重的《豐饒時節》而言，它除了展現贊助者純粹的美感品味外，其實用價值與功能始終是無法忽略的一環。

《豐饒時節》祈禱書便是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之中產生，書中多處出現首位贊助者—貝利公爵的個人標誌、家徽與生活記事，甚至肖像，欲剖析其中原委，不僅應考量到法國王室的藝術贊助傳統，實兼顧政治宣傳與資金融通的雙重功能，尚須探析公爵財產帳冊，並配合相關生平史料，討論公爵先後藏品之種類、材質、風格、意涵與功能，並針對手抄繪本類的收藏，以及財產帳冊中的評斷性文字與估價，探討贊助者的文化價值取向和藝術品味問題，試析其委託贊助背後的實際意圖和心理需求。

第一節 貝利公爵的生平與其個人形象的再現

基於貝利公爵的皇族身份，其生平史料並不難取得。宮廷內長期雇用的編年史家，紀錄當時政治、軍事、教會、經濟要聞，以 1370 年起，Jean Froissart 開始編纂的《西歐編年史》(Chroniques)為例，它記述自菲利普六世至查理六世統治期間，西歐諸國政局、軍事和文化的發展與交流，是瞭解 14、15 世紀法國史時常用參考書。⁸此外，從 18、19 世紀起大量出土的王室風采實錄、聖路易祭禮儀式、王室制訂之藝術家行為規範、皇家特許狀或法令、收支帳簿、交易契約、遺囑、

⁷ 關於西歐宮廷品味與權力結構交互作用之研究，參閱 John Barrow, *Aristocracy* (N. Y. : Basil Blackwell, 1984)及 Norbert Elias, *The Court Socie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⁸ Jean Froissart,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France, Spain, etc.*(London: I. M. Dent; N. Y. : E. P. Dutton, 1921)

遺產清冊等重要史料，使後人得以重構當時法國王室政權運作的實況，特別是文化與藝術贊助的部分。⁹關於後者，一般而言，王室帳冊通常是由「財務管理員」(argentier)個別處理，自 1315 年起，財務管理員還需負責管理王室的藝術收藏。因此，研究法國 15 世紀左右的宮廷贊助藝術時，「特殊帳冊」(comptes extraordinaires)與「財務帳冊」(comptes de l'argenterie)顯得格外重要。關於貝利公爵的個人史研究，幸有 François Lehoux 蒐羅貝利公爵之生平史料，從貝利公爵身為王室成員的立場，重建其政治生命¹⁰，得與 Meiss 側重在公爵的文化生命¹¹，相輔相成，以尋得政治與文化共同合作、交互運作的機制。

貝利公爵於 1340 年 11 月 30 日，英法百年戰爭的前夕，出生於范頌森林(Bois-de-Vincennes)的一座古老皇家住所，乃法王傑昂二世(Jean le Bon, 1319-1364)和皇后盧森堡的波恩(Bonne de Luxembourg, †1349)之三子。1350 年，菲利普六世(Philippe VI, 1293-1350)駕崩後，好人傑昂順利繼承王位，成為法王傑昂二世(Jean II, 1350-1364)；其母為波西米亞國王—盧森堡的傑昂(Jean de Luxembourg)之女、盧森堡亨利七世大帝(Emperor Henry VII of Luxembourg, 1303-1313)孫女，亦為法王查理四世(Charles IV, 1294-1328)姊姊。公爵的親母在他 9 歲時早逝，日後傑昂二世續絃，由繼母潔安布隆皇后(Jeanne de Boulogne, 1326-1360)扶養成人。公爵尚有兩位兄長，長兄查理，早三年出生(1338)，即日後查理五世(Charles V, 1364-1380)，又稱「聰明的查理」(Charles the Wise)；次兄路易一世(Louis I, 1339-1384)，1360 年授封為安茹公爵(Duc d'Anjou)，畢生積極奪取拿波里王國政權；四弟菲利王子(Philippe le Hardi, 1342-1404)，1363 年授封為勃根地公爵(Duc de Bourgogne)，1384 年授封伯爵。在傑昂二世夫婦的 11

⁹ 見 Ernest Lavisse, ed., *Histoire de France illustré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évolution* (Paris: Hachette, 9 vols, 1911); Peter S. Lewis, *Later Medieval France: The Polity* (London: Macmillan; N. Y.: St. Martin's Press, 1968); Raymond Cazelles,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de la fin de Philippe Auguste à la mort de Charles V, 1223-1380* (Paris: Hachette, 1972); Kenneth Fowler, *The Age of Plantagenet and Valois* (London: Ferndale, 1980)

¹⁰ François LEHOUX, *Jean de France, duc de Berri: sa vie, son action politique 1340-1416* (Paris: A. & J. Picard, 1966-1968)

¹¹ M. Meiss, "The Life of Jean de Berry," *The Lat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the Patronage of the Duke*, pp. 30-36.

位子女中，只有上述四位王子與另四位公主長大成人，其他皆早夭，姊妹中又以 Isabelle de France(1348-1372)特別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與文化活動。貝利公爵雖未能親掌王權，卻扮演皇子、皇弟與皇叔等多重國家要角，延續著法國法洛瓦家族之純正皇室血統（圖 3-1）。¹²

傑昂二世考量到父親—盧森堡的傑昂(Jean de Luxembourg，又稱「瞎眼法王」)皆名謂傑昂，故選擇同樣名為傑昂的貴族 Jean Conte d' Armagnac 為三子教父。由於貝利公爵出生當天為聖安德魯節，故他一生信奉聖安德魯為其守護神。例如：他在封地首都—布魯日的聖禮拜堂聖遺物箱中，供奉聖安德魯之手。¹³《豐饒時節》最後一張全幅畫作即為 聖安德魯的殉教（圖 3-2，f. 201）¹⁴。此外，公爵曾委託一不知名法國畫師，描繪他跪在施洗約翰和聖安德魯間祈禱（圖 3-3）相同的主題與形式亦出現在 Jacquemart de Hesdin 繪製之《布魯塞爾日課經》(Brussels Hours，圖 3-4)中，畫中增添端坐寶座的聖母子。¹⁵身為法蘭西始祖聖路易的後裔，貝利公爵亦繼承了三葉瓣百合花所代表的法國王權¹⁶，從 十二月令圖 中 一月 壁爐後方掛毯、宮庭系列的貴族皇袍，和 人體星象圖 中左右上方各一三百百合花圖式的盾形家徽，和象徵貝利公爵個人符號的天鵝、熊及 VE 重疊字樣（圖 3-5），可清楚辨識貝利公爵身為王室贊助者的身份。同時，圖作內容的選擇也反映出，貝利公爵相當習慣並樂於藉由委託製作藝術品的的方式，傳達個人的階級地位與正統王權，甚至主動參與個人形象的塑造，贊助者主導圖作內

¹² M Meiss, *ibid.*, p. 30.

¹³ 聖安德魯為福音使徒之一，彼得之弟，原為加利利漁夫，是最先跟隨基督傳教之人。關於他的生平資料相當少，多半出自《末代啟示錄》中 安德魯言行錄。據傳他曾深入黑海、中亞和希臘等地傳教行醫，由於他為羅馬統治者之妻治癒惡疾，導致夫妻失和，而被監禁、釘刑。他通常以白髮、長鬚的老者形象出現，附屬物為 X 形十字架(saltire)，在文藝復興初期繪畫中，他亦手持漁網或被繫在十字架上。見 J. Hall, *Dictionary of Subjects and Symbols in Art*(London: John Murray, 1974), p. 15.

¹⁴ Françoise LEHOUX, *Jean de France*, vol. 1, p. 4 n. 8.

¹⁵ E. Bacha, *Les Très belles miniatures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de Belgique*(1913), pl. 6.

¹⁶法王路易四世(1214-1270)於 1297 年追封聖人—聖路易，他是一位勇敢、智慧的領導者，其帶領十字軍東征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的功績，受人廣為稱道。他從聖地帶回權杖、王冠，和部分的真實十字架，這些聖物也被供奉在巴黎聖禮拜堂中。在第二次東征途中，路易四世罹患瘟疫過世於 Tunin。在藝術作品中，聖路易的皇袍上繡有代表法國國王的標誌—三葉瓣百合花，其附屬物為有刺王冠和十字架三釘痕，他通常身穿皇袍，手握寶劍，是巴黎和其出生地 Poissy 的守護神。見 J. Hall, *op. cit.*, p. 194.

容的事實顯而易見。

關於貝利公爵的童年，至今所知無幾，僅知由奶媽，騎士 Geoffroy de Germoles 之妻—Gille de Gaumont 扶養成人。他的童年並不富裕，先母歷經為期不短的經濟貧乏的窘境後，1349年9月11日死於瘟疫，葬於莫比松修道院(Abbey of Maubuisson)。三個月後，公爵祖母—勃根地的潔安皇后(Jeanne de Bourgogne)相繼離世，使他頓失兩位感情深厚的長輩。

當1350年父親繼承王位後，傑昂順理成章地升格為王子。同年9月26日傑昂二世於雷姆大教堂(Reims)加冕，曾提及授封騎士勳位的建議，但由於一些未知理由，封勳大典(Order of the Star)直至1352年1月初方於Saint-Ouen的貴賓廳(Noble House)舉行。¹⁷雖然當時傑昂有11歲，但這次封勳大禮等於為他的童年劃下句點。自此以後，傑昂和兄弟們，及Louis II de Bourbon、Philippe de Rouvre、Alençon和Etampes等伯爵，形成一個年輕的皇家團體，他們被冠上「年輕王者」稱號¹⁸，開始涉入家族內部合縱連橫的權力爭奪。

傑昂的姊夫—納瓦賀王查理(Roi Charles de Navarre)，戲稱為「兇惡查理」，他是菲利普六世長孫女—納瓦賀的布龍許(Blanche de Navarre, 1328-1398)後裔，對自身承繼菲利普六世的皇族正統甚感優越，因而認定傑昂二世是篡奪其先祖王權的政敵。他對現有的納瓦賀勳位，及有限的諾曼第封地極為不滿，對傑昂二世的侍從武官長，即卡斯提理安王子(Castilian Prince)-Charles de la Cerda，亦心懷嫉妒，故於1354年1月8日將他暗殺。這場謀殺是造成傑昂二世後半統治期間政治混亂的原因之一，最後導致子嗣政權不保。

當時貝利公爵年僅15歲，正要取得貴族爵位。1356年4月，他授封為布昂多伯爵(Comte de Poitou)，而後代理長兄查理王儲(Dauphin Charles)，掌握羅瓦河(Loire)南端領地統權。根據現存官方文獻，1356年6月，貝利公爵代表查理

¹⁷ Paris, Bibl. nat., fr. 20684, pp. 212 ad 214.

¹⁸ R. Cazelles & J. Rathofer, "Jean de Berry and His Collection," *op. cit.*, p. 195.

王儲，成為羅瓦河下游及整個朗格多(Languedoc)的代理國王。¹⁹事實上，布昂多伯爵轄地遍及 Poitou Limousin Angoumois Saintonge Berry Périgod the Auvergne，甚至朗格多領主管家的駐守地。對當時僅具布昂多伯爵頭銜的少年傑昂而言，要統御這片廣大封地，責任份外重大，故他延攬 Jean 與 Robert de Clermont 兩兄弟為國政顧問。同時，將統治中心設在布魯日，自此布魯日成為貝利公爵封地的首都與政經中心。

英法交戰結果不利，傑昂二世於 1356 年 9 月 19 日在布昂多領地受挫，受盎格魯格司肯尼人(Anglo-Gascons)襲擊，遭英王愛德華三世長子—「黑面王子」(Black Prince)擄為戰俘。由於戰爭形勢日益危困，年輕的布昂多伯爵連同兩位長兄退出戰場，至夏維尼(Chauvigny)避難，其父則淪為戰囚近四年之久。

接下來這幾年，年輕的布昂多伯爵雖暫時保留朗格多領地的代理管轄權，但掌握實權的卻是教父阿曼尼亞伯爵(Comte de Armagnac)。1357 年 12 月 14 日，貝利公爵接獲兩敕令，繼續握有朗格多的代理王權，其中之一來自溫莎堡的父親傑昂二世，另一則是來自其兄查理王儲。就法國王權體制而言，授予布昂多伯爵代理統治權不受王儲所限，然其兄查理五世卻視他為下屬，種下日後兩人衝突之因。

布昂多伯爵首先駐守 Auvergne 一地，而後遷至朗格多，企圖連結各城反抗軍，抵制盎格魯格司肯尼人和武裝軍團的攻擊。他盡力籌款，以支付英軍索求贖金，救回父親。財務吃緊一直困擾著貝利公爵，他的奢華享受與龐大開銷，使他常掏空財庫，向外借貸。由於布昂多遭英軍占領，於是他向其兄，即當時攝政王，請賜一塊政局安定之地，查理五世便授封他馬貢郡(County of Mâcon)。

1359 年，貝利公爵 19 歲時，選擇為他受洗的阿馬尼亞克伯爵(Comte de Armagnac)之女—Jeanne d' Armagnac 為妻，日期應為 1359 年 10 月 17 日，地點在賀爹大教堂(Cathedral of Rodez)。不過，兩人的婚姻因觸犯兩項教規，而告無效，其一為不得迎娶教父子女，另一則是遠房表親不得成婚，唯有教宗特赦方

¹⁹ LEHOUX, *op. cit.*, vol. 1, pp. 55-57.

能化解爭端。於是，八個月後，兩人於 1360 年 6 月 24 日在卡卡松(Carcassonne)再度舉行婚禮儀式。²⁰

當時英國和法國處於和平前夕。1360 年 5 月初，雙方在夏特(Chartres)近郊簽訂布列丁尼協定(The Treaty of Brétigny)，同年 10 月 24 日，在卡萊(Calais)確認該協議後，傑昂二世得自由返國。正值此刻，布昂多伯爵改變頭銜為貝利公爵。在交換割讓給英國愛德華三世的布昂多領地時，他自父王獲取貝利(Berry)和奧維(Auvergne)兩地，1360 年 7 月 4 後，他授封貝利公爵勳位，此為終生尊封之爵號，後代子孫得以受用。²¹

然而，貝利公爵為求英軍釋放其父，必須前往英國作質，以確保法國將支付大筆贖金。他停留英國達四年之久，活動範圍僅限於倫敦市區。不過，可因娛樂上的需要離開倫敦，例如散步或打獵，前提是必須在日落前返回市區。在他作質期間，也有些法國人留居英國，英吉利海峽上往來極為頻繁。儘管留英法人並不多，但他們一直持續接訪本國人士，並受到良好待遇，愛德華三世甚至同意貝利公爵於 1361 年 5 月歸國訪視，條件是返回英國繼續作質。儘管貝利公爵懷鄉情切，但他並未仿效安茹公爵，違反戰虜宣誓，去國不返。他始終遵守諾言，並與他人聯繫，共同制定和平協議，加速以土地和城鎮，與英交換人質。

1364 年 1 月，傑昂二世訪英，與英王愛德華三世交涉和平協議與釋放人質事宜，並與貝利公爵在英國會晤。旅途中，傑昂二世健康惡化，於 4 月 8、9 日夜間病逝倫敦。當時只有貝利公爵一人隨伺在側，他親眼目睹父親草擬最後遺囑，並伴隨由倫敦至多佛的送葬隊伍，是唯一參與傑昂二世在英國聖保羅教堂舉行喪禮的法國皇家成員。基於人質身份，他無法伴同父親遺體返回祖國。從公爵財產帳冊中，留有許多追念父親之物，可知父子之間的深厚親情。

1365 年初或 1364 年末，愛德華三世允許貝利公爵短暫返國。他在勃根地公

²⁰ LEHOUX, *ibid.*, p. 141.

²¹ S. Vitte, "Formulaire de la chancellerie royale,"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vol. 48(1931), p. 141.

爵的陪同下，依序至馬貢郡、奧維、貝利等領地巡視。在停滯近一年後，於 1365 年末或次年初，再度返英作質。愛德華三世為表心胸慷慨，特准他以人質身份，繼續留滯母國一年。不久，英法再度交戰，貝利公爵受命防衛法國中部與西邊領土，即塞納河與羅瓦河中岸地帶，伺從武官長 Du Guesclin 趁機收回布昂多領地。1374 年，公爵攻佔路西農(Lusignan)，與英軍首領—威爾遜的伊凡(Yvain of Wales) 引領的反抗軍對峙。

查理五世與貝利公爵的關係急遽惡化。1374 年起，查理五世不再委託公爵新任務，改由其他兄弟擔任。此外，公爵被迫交還 Saintonge 和 Angoumois 兩地統治權。查理五世晚年期間，貝利公爵幾乎是黯淡地與其妻小共度。

1380 年，查理五世過世後，英軍再度入侵，而查理死前廢除家庭稅的政令，使法國斷絕經濟支援。朗格多地區一片混戰，Du Guesclin 也已過世，新國王查理六世年僅 12 歲。為避免其他皇室奪權，查理六世在國政事務上遵循安茹、貝利、勃根地、波龐(Duc de Bourbon)等四位叔伯諫言。貝利公爵再度得權，立即授封為鐸敦河(Dordogne)南岸領地總指揮官(Lieutenant General)。這些轄地，再加上原先公爵的封地，使他儼然成為法國中央與南部的總督。

此時，貝利公爵開始進行一些個人建築計畫，譬如修護波昂提耶堡(Château de Poitiers)和希翁宮(Palais de Riom)。²²基於實際需要，他必須涉入軍事與外交事務，長期留居領地以外地區。因此，原領地的行政事務權便假手他人。1381 年，貝利公爵請求查理六世，贈與塞納河左岸一棟宏偉輝煌的巴黎住所—Hôtel de Nesle，地近皇宮不遠。1385 年，安茹公爵過世後將財產過繼給貝利公爵，使他的個人封地又增加 Lunel 和 Etampes、Gien、Aubigny、Dourdan 四地產權。接著，貝利公爵促成其子 Jean 與法王姊妹 Catherine de France 聯姻，賜予他孟龐樹伯爵(Comte de Montpensier)勳位。

貝利公爵轄地內的人民在沈重的家庭稅賦下，向首都巴黎投訴。1388 年，

²² LEHOUX, *ibid.*, vol. 2, pp. 70-71 及 101-103.關於這些建築，乃貝利公爵雇用 Guy de Dammartin 和著名石匠 Claus Sluter the Elder 共同完成。見 H. Stein, “Claus Sluter l’ aîné et Hannequin de

當時年滿 21 歲的查理六世，受先王舊臣 Marmousets 等人力勸，在未徵求叔父貝利公爵與勃根地公爵的意見下，斷然審判並處決貝利公爵代理人—Bétisac，同時取消公爵在朗格多的管轄權，令他善盡領主責任。這次行動無疑是查理六世在眼見貝利公爵勢力日漸坐大之時，藉機展現王法、重拾王權，具有濃厚的政權防衛意味，也導致日後兩方關係緊張。

當公爵首任夫人過世後，他以 49 歲之齡續絃，對象為一名年僅 12 歲的少女—布隆的潔安(Jeanne de Boulogne, 1377-1422)。她在福瓦伯爵(Comte de Foix)—Gaston Phébus 扶養下成長，是布隆郡(County of Boulogne)的女繼承人，及 Auvergne、Picardy、Beauvaisis 三地領主。1389 年 6 月 5 日，兩人於希翁(Riom)舉行婚禮。恰逢其子傑昂和妻子 Catherine de France 分居，於是公爵安排兒子與拉瑪許伯爵(Count of La Marche)—Jeanne de Bourbon 之女 Anney 再婚。²³

貝利公爵的中、晚年實毀譽參半。他經法王委任，分別與教宗、英國國王和布列塔尼公爵進行一連串的外交斡旋，因此受到一些政治攻訐，與查理六世的關係處於不安之中。當 1392 年 8 月 5 日，查理六世精神惡疾首度發作，在途經樂曼森林(Le Mans)時，貝利公爵連同勃根地公爵，和查理六世的親兄弟—奧里昂公爵(Louis d'Orléans)，趁機奪權，並驅逐法王國政顧問 the Marmousets。他們延長與英國的停戰協議，並企圖化解教皇權自 1378 年的分裂情勢。這段期間，貝利公爵幾乎主宰皇家議會(Royal Council)，所有大事皆需經其認可，方得實行。1397 年，公爵獨子傑昂過世，在無後嗣繼承的情況下，他將所有個人地產移交法王。同年，其女婿，即次女之夫—Philippe d'Artois 又過世。

當公爵年近六十，自覺有深入貝利領地之必要，因此他將統治權交由四弟代為掌理，在少妻、獨子遺孀孟龐樹伯爵夫人 Anne de Bourbon 的陪同下，遊歷各地城堡。當他暫居布魯日時，曾盛大迎接來訪的拜占庭皇帝曼紐因二世 Manuel II(1391-1425)。

Bois-le-Duc à la cour de Jean de Berry,” *Bibl. Ecole des Chartes*, vol. 60(1899), pp. 86-93.

²³ LEHOUX, vol. 2, p. 263.

同時，巴黎正因勃根地公爵與奧里昂公爵，針對受困的查理六世，提出不同迎就策略，而形成某種政治角力。基於資歷與輩份之考量，貝利公爵成為調停宮廷鬥爭的不二人選。貝利公爵自然偏袒弟輩勃根地公爵(Philippe de Bourgogne)，排擠處心積慮欲進入叔伯輩勢力圈的皇姪奧里昂公爵。查理六世為報償貝利公爵適時介入，重新交還朗格多、貝利、奧維、布昂多領地及其他政治、軍事、財政利益。歷經 12 年過後，貝利公爵重拾法國中部與南部的統轄權。

1404 年 4 月 27 日 Philippe le Hardi 過世後，法國政局日益混亂，尤其是英法再度瀕臨戰爭邊緣，法國是否與敵軍聯盟的爭議更形擴大。新的勃根地公爵 Jean sans Peur 性格殘忍，求戰態度更堅決，貝利公爵的協調任務難上加難。1405 年 8 月 21 日，貝利公爵受命為巴黎總指揮(Captain General of Paris)，成功避免內戰。然 1407 年，Jean sans Peur 卻教唆、暗殺奧里昂公爵。為化解以 Louis d'Orléans 為首的「阿馬尼亞克黨」(Armagnacs)，和以 Jean sans Peur 為首的「勃根地黨」兩方對峙情勢，1409 年 3 月 9 日，貝利公爵在夏特教堂內安排和解。公爵與王儲同跪在查理六世跟前，為勃根地公爵尋求寬恕，並接受教宗特赦。

當奧里昂公爵之子—Charles d'Orléans 喪偶時，貝利公爵隨即安排查理與其孫女 Bonne 於 1410 年 4 月聯姻，以爭取奧里昂家族認同。自此，貝利公爵被歸為「阿馬尼亞克黨」，間接與 Jean sans Peur 同盟的巴黎市民及查理六世結為宿敵。接著，王室內戰再度爆發，公爵領軍進駐巴黎比塞特城堡(Château at Bicêtre)。由於巴黎飢荒成災，公爵只得簽訂比塞特和約，退守貝利。當 1411 年 10 月 23 日，Jean sans Peur 進駐巴黎後，巴黎市民大肆掠奪公爵在比塞特城堡與 Hôtel de Nesle 內的珍藏文物，同時公爵被褫奪朗格多統轄權，而後全心統轄阿馬尼亞克領地。

1412 年，查理六世聯合勃根地公爵，包圍貝利公爵的首都—布魯日。他們轟炸該城及公爵住處，戰火迫使公爵遷移七次，甚至必須熔化聖禮拜堂內的遺物箱和珠寶，以支付軍隊薪餉。最後雙方達成停火協議，但布魯日始終未投降。

1412 年 10 月，公爵重回巴黎，在 Hôtel de Nesle 度過冬天。1413 年 1 月，

當法王召開國家議會時，所有同情勃根地公爵的巴黎人，群起反抗，逮獲王儲隨從中幾位重要人物。這些反議人士要求政府改革，並傳播法令(ordonnance cabochienne)。貝利公爵年高 72 歲，無法違逆潮流，而他在巴黎兩住所也飽受威脅。為保全餘生，他逃往巴黎教堂修道院內避難，情緒陷入極度低潮。

不久，Jouvenel des Ursins 領導的軍隊將反抗人士(Cabochien)驅逐出境，Jean sans Peur 撤出巴黎，貝利公爵二度任命為巴黎總指揮，在王儲旗幟下，他以神聖之姿重返巴黎，並再度取得朗格多統轄權。貝利公爵得以重回巴黎住所，他將布魯日公爵宮殿的珍貴寶物運至巴黎，置於 Hôtel de Nesle 內，不時親臨前巴黎市長 Hugues Aubriot 的住所—Hôtel de Giac。雖然處境極為艱困，但貝利公爵的下半生依舊在奢華中度過。

1415 年，英國決定對歐陸進行另一波軍事攻勢，著陸點為法國塞納河口，並攻下阿芙勒(Harfleur)。同年 10 月，年邁的貝利公爵亦肩負著抵抗英軍的重任，事實上，他並未親身參與 1415 年 10 月 25 日的阿穹固戰役(Agincourt)。在這場戰役中，許多法國貴族戰死，其中包括公爵孫女(Bonne d' Artois)夫婿—內維伯爵(Comte de Nevers)。公爵的女婿—布龐公爵(Duc de Bourbon)、孫子—虞伯爵(Comte d' Eu)，和姪子 Charles d' Orléans 等人皆淪為戰俘。經過戰敗重擊，健康情形不佳的貝利公爵只得放棄騎馬，採水路返回祖國。但他的騎士尊嚴與榮耀卻因阿穹故一役大大折損。他將統帥權交給法國同從武官長(Constable of France)的女婿—Bernard d' Armagnac。自知體力漸衰的貝利公爵，在晚年修改並增訂遺囑內容，將 Hôtel de Nesle 珍藏寶物，由布魯日聖禮拜堂繼承。

1416 年 6 月 7 日，查理六世獲悉貝利公爵不久於人世，親身造訪，並准許遺囑內容。1416 年 6 月 15 日，貝利公爵逝於 Hôtel de Nesle，當時僅有其女瑪莉隨伺在側。他的內臟被取出，置於巴黎教區禮拜堂 Saint-André-des-arcs。而後，整個喪葬儀列行至奧古斯丁教堂(Church of the Augustians)舉行神聖禮拜，最後離開巴黎，前往布魯日，安葬於聖禮拜堂。同年 6 月 26 日，貝利公爵的遺物被置

於聖艾田教堂(Cathedral of Saint-Etienne)中作為紀念。²⁴

從現存的文字與圖像史料可知，貝利公爵十分喜歡再現自己的形象，無論是僅凸顯其外觀特徵，或完整地描繪全身肖像，它們大多出現在徽章、細密畫或雕像等媒材上。Meiss 甚至將這些肖像加以彙整、分類，確定為公爵肖像者共計 66 幅，未能確定者有 2 幅，另有 4 幅尚且存疑。²⁵姑且不論這些身份判斷的真確性如何，在與其他王室成員相較之下，貝利公爵肖像數量之多，已遠遠超出法國法洛瓦王室自傑昂二世（圖 3-6）查理五世（圖 3-7）Philippe le Hardi（圖 3-8）Jean sans Peur（圖 3-9），乃至 Louis II d' Anjou（圖 3-10）的宮廷肖像傳統。就連彙整貝利公爵財產清冊的 Jules Guiffrey，都對公爵對再現個人形象的狂熱程度，感到不可思議。²⁶

現存最早的貝利公爵形象，就屬 1365 年 Jacques de Chartres 委託雕塑師 Jean de Cambrai 製作的公爵雕像，原置於羅浮宮大型迴旋樓梯間，可惜未能流世。所幸畫家霍爾班(Hans Holbein the Younger)生動地描繪公爵與第二任公爵夫人，跪在布魯日聖禮拜堂的半圓形殿內，白色聖母像(Notre-Dame-la-Blanche)前方之立像（圖 2-9），配合現存於布魯日市立博物館的斷頭公爵像（圖 3-11），使後人得以想像其真實面貌。另外，Jean de Cambrai 二度為公爵雕製石棺像（圖 2-10），原置於布魯日聖禮拜堂，18 世紀移至主教堂。上述三尊公爵大理石像應在公爵生前製作，以祈禱和送葬形象為主，相當符合中世紀的人物再現規範。從現存雕像，尚可清楚辨識出公爵的外型與五官特徵，他沒有早期法洛瓦家族的高挺鼻梁，和修長、瘦窄的臉型。相反地，他的頭型較渾圓、窄短，鼻型屬寬而厚實的獅子鼻，前額較低，顴骨相當高。身材不高，體型略胖，隨年事漸高而日漸臃腫。

除了大理石像外，貝利公爵的形象也出現在徽章、官印（圖 3-12）私章（圖

²⁴ 上述關於貝利公爵傳記資料，見 Meiss, "The Life of Jean de Berry," *The Lat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the Patronage of the Duke*, pp. 30-36.; R. Cazelles & J. Rathofer, *op. cit.*, pp. 195-199.

²⁵ Meiss, "Appendix B: Catalogue of Portraits of Jean de Berry,"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the Patronage of the Duke*, pp. 82-94.

²⁶ "Qu' il se fit illusion sur ses avantages physiques, c' est une hypothèse difficile à comprendre..." 引自 J. Guiffrey, *Inventaire*, vol. 1, p. 65.

3-13) 結婚證書(圖 3-14) 教堂鑲嵌玻璃²⁷、聖餅碟金工飾樣, 和木板畫中²⁸。約 1370 年, 公爵中年以後鑄模、使用的重要徽章, 尚且留存至今。這些形像呈現出多樣化的公爵臉部輪廓與五官特徵, 差異性相當大, 可能與不同產地是否容易取得公爵肖像範本有關。²⁹

相形之下, 貝利公爵的肖像以經卷畫作品為多, 形象較一致, 不外乎與祈禱、獻呈、旅行等三大母題有關, 其中又以祈禱書中多次出現公爵跪在聖母子或上帝跟前, 側身合十祈禱的主題數量最大。這些圖作原本僅位於書頁大寫字首上方或邊緣預留的飾圖空間, 佔據面積較小, 但隨後逐漸出現占滿整幅畫面的表現。以

1390 年, 一未知名法國畫師繪製的 貝利公爵跪在聖安德魯和施洗約翰間祈禱(圖 3-3), 和 Jacquemart de Hesdin 在《布魯塞爾日課經》中類似主題與構圖的

貝利公爵與聖安德魯及施洗約翰, 跪在聖母前祈禱(圖 3-4) 為例, 畫家藉由公爵所處位置、施洗約翰的眼神和聖安德魯扶持公爵的動態, 使公爵成為全畫的視覺中心, 其專注、虔敬的神態是畫家亟欲捕捉的焦點, 強化公爵為虔誠教徒之王者形象。整體而言, 這類作品亦不脫中世紀祈禱書的圖像傳統。在相關畫作中, 又以《大日課經》中 公爵在聖彼得引領下進入天國(圖 3-15, f. 96) 表現最具原創性。畫家打破最後審判的圖像傳統, 聖彼得不再引領一群君主、主教、修士集體升天, 而是左手拉住貝利公爵的手, 僅許他進入天國。有趣的是, 公爵身穿紅絨貂領的早期官袍, 右手托著胸前那顆著名的淺藍色巨型寶石(balais)³⁰, 暗示了珠寶不但只是上帝純潔、非物質性光輝的寫照, 讓祈禱者得以藉此冥想上帝之存在³¹, 更有助於他獲得拯救、進入天堂。對公爵而言, 珠寶兼具宗教救贖與取

²⁷ 貝利公爵曾為布魯日主教堂的鑲嵌玻璃主題之一, 引自 Champeaux & Gauchery, *Travaux*(1894), p.20. 見 Meiss,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the Patronage of the Duke*, p. 68.

²⁸ J. Guiffrey, *Inventaire*, vol. 2, p. 54 no. 380 與 p. 143 no. 1159 記載:「兩幅跪立像, 一為公爵閣下, 另一為公爵夫人。」(“deux images à genols, l’une pour Monseigneur et l’autre pour Madame”)此外, 1516 年勃根地的 Margaret of Austria 典藏清單中, 也記載「一件鍍金木板畫, 繪有貝利公爵臉部」(“ung autre tableaux d’argent doré là où est le visage du duc de Berry”)。見 Meiss, *ibid.*, p. 377.

²⁹ Meiss, *ibid.*, p. 68.

³⁰ 此寶石為公爵所藏珠寶中價值最高者, 據悉來自近東, 乃查理六世所贈。見 Meiss, *op. cit.*, p.50.

³¹ 就畫中公爵配戴珠寶而言, 中央藍寶石象徵天體, 四周六粒珍珠象徵上帝。關於法國中世紀珠寶的宗教意涵, 可參酌 Panofsky, *Abbot Suger*(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Evans,

悅感官的功能，而這件作品正能突顯出中世紀末，個人主義與世俗精神日益增強的文化傾向。

關於獻呈母題的細密畫，主要有珠寶和書籍兩類獻呈物。前者可見布希戈畫師(Boucicaut Maste)繪製之 向貝利公爵獻呈貴重珠寶 (圖 3-16)；後者現存更多散頁作品，諸如：淑女之城工作坊(Cité des Dames)與一匿名法國畫師皆繪有 學者佩米耶費(Premierfait)向公爵獻呈薄伽丘手抄書 (圖 3-17 與圖 3-18) 盧松工作坊(Luçon Workshop)繪製的 學者賈克勒貢(Jacques Legrand)向貝利公爵獻書 (圖 3-19)。³²畫中捐贈者與收受者左右並列，公爵端坐在王位上，接過跪地獻呈者雙手交奉之物。獻呈手抄本的母題更為傑昂二世及查理五世大量使用，顯示法洛瓦王室向來偏好義大利文學與藝術的家學淵源，若配合公爵圖書館清冊的細目分析，更能瞭解他對薄伽丘及當時法國方言文學的獨特興趣。³³

另外，旅遊平安的母題現存 3 幅，分別出現在《小日課經》(圖 2-10)《聖母的美好時節》(圖 2-13)和《美好時節》(圖 2-12)中，皆為蘭布兄弟所繪。根據 Meiss 之斷代，公爵在 1408-10 年間，十分著迷這類祈禱主書題，加上當時他甚少出遊，應與阿馬尼亞克黨和勃根地黨日漸交惡的政爭有關，尤其是 1407 年 Louis d'Orléans 遭害後，人人自危的緊張局勢造就出這類作品。³⁴

由上述這些肖像畫，使後人得以觀察貝利公爵在髮型、鬍型與服飾上的外在轉變。Hulin de Loo 與 Paul Durrieu 皆針對現存 35 幅細密畫中的公爵肖像，各自發展出其歸納與推論。然而，Millard Meiss 批評前人判斷實忽略重要的印章人像，應加以修正。根據 Meiss 的整理，公爵在 1370-1385 年間，以當時男性貴族流行的長髮、留鬍與雙山羊鬍面貌示人(圖 3-20)；1380 年中期至 1405 年初，他將鬍疵刮得相當乾淨，並減短頭髮，見(圖 3-3) (圖 3-4) 圖(3-13) 圖(3-14)。這段期間，經常穿著華麗的紅色絨袍(manteau d'apparat)，上端圍著白貂披肩，頸

Magical Jewels(1922)。

³² Meiss, *op. cit.*, pp. 69-70.

³³ Meiss, "The Duke's Library,"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the Patronage of the Duke*, pp. 287-318.

³⁴ Meiss, *ibid.*, p. 71.

部露出袍外；1406-09 年間，他違背當時宮廷習俗，重新蓄短鬚疵，配戴一條鑲有珠寶的黃金項鍊（圖 3-21）；1409 年後，公爵再度剃光鬚疵（圖 3-15），經常穿著高領的斗篷式外袍(houppeland)，頸部掛有珠寶鍊飾，頭戴毛帽，見《豐饒時節》中一月。³⁵公爵對於宮廷的流行文化瞭若指掌，他也相當自覺於個人形象的呈現，不論從現存作品的主題或內容，皆可發現公爵習慣並善於利用視覺圖像，表現並記錄自己，他明白自己在法國王室中「接近權力核心，但又處處受限」的尷尬地位。因此，他所形塑的自我形象是一位政治野心不大、宗教信仰虔誠，並熱愛世俗美感的王室文藝贊助者，以求在錯綜複雜的王室內鬥中居於中庸、安然自處，進而左右逢源。

另外，從畫像本身的媒材與形式，亦可見貝利公爵獨到的政治思維。中世紀末的法國，也開始在教堂及公共、私人建築中，再現王室譜系的肖像，這類肖像是統治者的公眾象徵，可分送王室成員或外國使節，作為展現、鞏固或宣揚權力中心之用，運用的媒材以雕像、壁畫和板面繪畫為主。查理五世、貝利公爵和另兩位兄弟都曾在羅浮宮正殿樓梯設置個人塑像。貝利公爵在巴黎的比塞特城堡(Château de Bicêtre)內特設肖像畫廊，展示當時名人與古聖先賢的畫像，包括法國歷代國王與皇后、西歐與東歐皇帝、教宗克萊蒙七世、主教，取決標準是以其地位，而非成就為主。³⁶在北方，特別是法國，最早的板面繪畫多半為官方肖像畫，起於法洛瓦家族政權初立之時，諸如：傑昂二世、查理五世、Louis II d' Anjou Jean sans Peur、Philippe le Hardi 等，都有標準的官方肖像畫存世，人物以側面、3/4 身長的模式呈現。這些板面繪畫數量眾多，以教堂、宮殿等公眾空間為展示場所，深具政治宣傳的功能。³⁷和其他皇族不同的是，貝利公爵雖深諳此王室傳

³⁵ Meiss, *ibid.*, p. 79-82.

³⁶ Meiss, *ibid.*, p. 74-75.

³⁷ 關於法國 14、15 世紀王室肖像之政治功能，可參酌 Raymond Cazelles, "Peinture et actualité politique sous les premiers Valois Jean le Bon ou Charles, Dauphin," *Gazette des Beaux-Arts*, 92(1978), pp. 53-65; Jean-Bernard de Vaivre, "Sur trois primitifs français du XIVe siècle et le portrait de Jean le Bon," *Gazette des Beaux-Arts*, 697(1981), pp. 131-156; Jeffrey Chipps Smith, "'Jean de Maisoncelles' Portrait of Philippe le Bon for the Chartreuse de Champmol: A Study in Burgundian Political Symbolism," *Gazette des Beaux-Arts*, 99(1982), pp. 7-12; Dagmar Eichberger and Lisa Beaven, "Family Members and Political Allies: The Portrait Collection of Margaret of Austria," *Art*

統，但至今卻未留有貝利公爵的板面肖像畫，而多半是較私密的印章與細密畫。從 1516 年 Margaret of Austria 的典藏記錄³⁸，和 1715 年 Roger de Gaignières 複製蘭布兄弟之 貝利公爵草圖（圖 3-22），研判它應模自肖像畫範本，或許可證實公爵亦繪有一官方肖像畫。³⁹然而，貝利公爵並未大量繪製這類畫像，反而選擇以私人祈禱書為自我再現的主要媒介，表現出無意角逐政權的立場，顯現其內斂、妥協的性格。

究竟貝利公爵是否本性如此，尚無法斷然立論，但他確實向外界傳達出這樣的訊息，有兩例為證。其中之一是，1394 年人文學者 Thomas de Saluces 在其《漫步的騎士》(Chevalier errant)中，記述公爵不因政務而阻礙其收藏雅好，有一則軼事為例。公爵原與宮廷朝臣談論朗格多領地攝政權的問題，而後兩位威尼斯珠寶商獻上紅寶石、藍寶石與其他貴重寶石，詢問其購買意願。於是，公爵立刻離席，洽談此事。⁴⁰另一例為編年史家 Froissart，記述一段查理六世與貝利公爵的談話，話中法王戲諷公爵對紅寶石的收藏狂熱，就連異教國王餽贈價值兩萬法郎的紅寶石，都無力抗拒。⁴¹此外，1409 年，布希戈工作坊繪製的《皮耶薩勒蒙對話錄》(Dialogues de Pierre Salmon) 中 薩勒蒙向查理五世獻呈手抄本（圖 3-23）一圖，貝利公爵目光轉向左側同伴身上配戴的珠寶，完全無視於前方獻書的官方儀式。由上述文獻與圖像史料足以證實，公爵不但藉由贊助文化與藝術活動彰顯其尊貴、奢華的王室風範，更間接、細微地向其他王室成員傳達自己其實並不戀棧政權，反而喜好賞玩奇珍異寶的文化政治家秉性，以避免自己受到宮廷政治鬥爭的波及，特別是減輕在位期間一直深感政權受危的查理五世與查理六世，對他這位

Bulletin, 77(1995), pp. 225-248.

³⁸ 見註 28。

³⁹ Meiss, *op. cit.*, p. 76.

⁴⁰ “.rubiz et balaiz et autres pierre précieuses, car ilz savoyent que moult amoit telles chose..?” “Alors il ne songea plus au’ aux pierres, ”引自 Thomas de Saluces, *Le chevalier errant*, Paris, Bibl. nat., fr. 12559(fol. 158v.). 見 Meiss, *ibid.*, p. 70.

⁴¹ “.cette question que lui posa Charles VI: “Beaulx oncles, se l’ Amourath Bacquin, ou le souldan, ou ung autre roy payen vous envoioit ung rubis noble et riche, je vous demande se vous le recepvriés?” Le duc de Berry respondy et dist: “ Monseigneur, j’ en auroye conseil.” Or fut il dit et remonstré du Roy, pour tant qu’ il n’ y avoit pas dix ans que le souldan luy aviot envoyé ung rubis, lequel il avoit acheté vingt mille frans.”引自 Froissart, ed., *Lettenhove*, XV, pp. 351 f.見 Meiss, *ibid.*, p. 377.

位高權重的皇子或皇叔身份，始終抱持若即若離、亦敵亦友的防衛心態。

第二節 貝利公爵的財產清冊

藉由已出版的部分遺產清冊和開支帳簿，後人得以窺見貝利公爵這位藝術鑑賞家獨特的文化品味。所謂遺產清冊(inventaire)，指的是在收藏者過世後，由遺產管理與執行人(通常為國王)委派專人進行所有遺產的彙整、編目及認證工作，目的在於分配遺產及支付債務。當時，除了貝利公爵之外，查理五世(1380年)⁴²、安茹公爵 Louis d' Anjou(1384年)⁴³、奧里昂王室 Louis d' Orléans(1408年)⁴⁴、勃根地王室 Philippe le Hardi(1404年)⁴⁵、Jean sans Peur(1420年)⁴⁶、Marguerite de Bavière(1424年)⁴⁷等王族，皆有遺產清冊留世。其中，奧里昂公爵(Louis d' Orléans)和貝利公爵更屬異數。前者自1380年起，就開始詳細編纂珠寶清冊⁴⁸，而貝利公爵也是在世時就開始登錄名下財產。據悉，1373年查理五世還請求貝利公爵的圖書館員—Gilles Malet，為其豐富藏書籍進行編目。⁴⁹

六十歲大壽後，貝利公爵開始編纂第一份財產清冊(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Paris, BN MS. fr. 11496)。這項工作從1401年12月2日起，由珠寶管理員(garde des bijoux)—Guillaume de Ruilly，於杜旦堡(Château de Dourdan)內進行，之後移往公爵的巴黎住所 Hôtel de Nesle。1402年5月，編錄工作由勤於算

⁴² Jules Labarte, *Inventaire du mobilier de Charles V*(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79)

⁴³ L. Laborde, *Glossaire français du moyen-âge, à l'usage de l'archéologue et de l'amateur des arts, précédé de l'inventaire des bijoux de Louis, duc d'Anjou, dressé vers 1360*(Paris: Vinchon, 1872); Henri Moranville, *Inventaire de l'orfèvrerie et des bijoux de Louis I, duc d'Anjou*, 2 fascs.(Paris: Ernest Leroux, 1903-4)

⁴⁴ F. M. Graves, *Inventaires de la maison d'Orléans(1389 et 1408)*(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26)

⁴⁵ Bernard Prost, *Inventaires mobiliers et extraits des comptes des ducs de Bourgogne de la maison de Valois 1363-1477*, 2 vols(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Paris: Ernest Leroux, 1902-13); G. Peignot, *Catalogue d'une partie des livres composant la bibliothèque des ducs de Bourgogne au XV^e siècle*(Dijon: 1841)

⁴⁶ Michel Mollat & Robert Favreau, *Comptes généraux de l'état bourguignon entre 1416 et 1420*, 3 vols(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65-69)

⁴⁷ Dehaisnes, "Inventaire des biens meubles laissés par Marguerite de Flandre, duchesse de Bourgogne," *Histoire de l'art dans la Flandre, l'Artois et le Hainaut avant le XV^e siècle*, vol. 2(Lille: 1886)

⁴⁸ Henri Moranville, *Inventaire de l'orfèvrerie et des bijoux de Louis I, duc d'Anjou*, 2 fascs.(Paris: Ernest Leroux, 1903-4)

⁴⁹ Leopold Delisle, *Recherches sur la librairie de Charles V*, 3 vols(Paris: H. Champion, 1907);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a librairie de Charles V*(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68)

數、細心負責的 Robinet d'Étampes 接手，再轉至梅亨(Mehun)及布魯日(Bourges)兩地。⁵⁰Meiss 根據 1402 年至 1412 年間，Robinet 陸續登錄之所有財產清單，企圖重建 1412 年 2 月 1 日至 1413 年 1 月 31 日編纂之第二份財產清冊。該帳冊今已軼失，但 Meiss 重新建構這份重要文獻，特別是指出作品的出處與取得方式，有助於日後藝術史學者對十五世紀手抄繪本的流傳與發展有更進一步的瞭解(附錄一)。⁵¹

Robinet 繼續登錄日後藏品，直至公爵過世為止。他完成藏品取得的文字登錄作業，可謂現代博物館之先鋒。儘管 1416 年 5 月 25 日公爵擬訂遺囑時，Robinet 也在場，日後又參與公爵死後幾次財產清冊的稽核作業，但是最後還是在遺囑執行人—查理六世的明令下，轉交 Jean Lebourne 編錄第三份財產清冊，即遺產清冊，該文件現藏於法國聖傑內維葉圖書館(Bibliothèque Sainte-Geneviève, Paris, Lf. 54)。Lebourne 將所有物件以略低於蒐購價格，重新估價，由於公爵生前極盡奢華，鉅資興建大型建築、蒐藏各式奇珍，因此他過世時反而處於破產狀態。這些債主多半是當初向公爵販售珠寶與藝術品的仲介商，其中大部分為出自倫巴底和托斯卡尼地區的銀行家、兌幣員與富商，少數為法國商賈，他們擁有大筆資金，以高度組織化的方式經營旗下事業，諸如：Luccese 一地著名的 Rapondi 與 Spifami 家族，在法國的巴黎、迪戎、亞維農、尼德蘭的布洛日(Bruges)和義大利各地皆設有分行。他們不僅適時提供公爵財務借貸服務，還向他推銷各類珍奇寶物，包括：貴重珠寶、金製飾品、徽章、手抄繪本、刺繡、織毯，甚至獨角獸的角等。由於稀有寶石和珠飾可立即變現，用來抵押債務，故為藏品中最大宗。⁵²

19 世紀末，Jules Guiffrey 彙整上述三份財產清冊，出版重要的《貝利公爵財產清冊：1401-1416》，共計兩冊。⁵³第一冊探討貝利公爵之生平與贊助，並依據上述三份財產清冊，追查今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的 78 件手抄繪

⁵⁰ Meiss, *op. cit.*, p. 40.

⁵¹ Meiss, *ibid.*, pp. 415-417.

⁵² Meiss, *ibid.*, pp. 45-48.

⁵³ Jules Guiffrey, *Inventaires de Jean, duc de Berry (1401-1416)*, 2 vols (Paris: Ernest Leroux, 1894-96)

本。文中甚至詳述 1413 年第二份財產清冊與 1416 年第三份財產清冊之估價差異，遺產清冊並收錄 貝利公爵遺囑與遺囑附錄。⁵⁴；第二冊蒐羅了 1401 年第一份財產清冊，附錄包括 Hiver de Beauvoir 評注、1394 年珠寶買賣記錄，及 1370-78、1397-1404、1413-15 年間公爵在巴黎住所的開支記錄。由於上述財產清冊是由公爵和財產管理員共同編錄，故經由對照這三份不同登錄員所做的財產清冊，足以瞭解貝利公爵如何選取、累積藝術資產，以及他賦予這些物品的功能和價值。

蒐藏品的概念：物的分類與選取

貝利公爵將所有藏品分散在各地城堡、豪宅、圖書館和布魯日聖禮拜堂中，量與質皆十分驚人，可概分為不動產和動產兩大類。前者為公爵持續擴建、整修、重建的 17 座城堡、宮殿和教堂，分佈範圍不限於封地首都布魯日與晚年常駐的巴黎，在 Mehun-sur-Yèvre、Concressault、Genouilly、Nonette、Usson、Graçay、Aubignysur-Nère 等偏遠鄉間，公爵另建有度假行館(“maison de plaisance”或“Bon Repos”)；後者大致可歸納出手抄本、珠寶(joyaux)與金工(orfèvrerie)、徽章與印鑑、織毯與刺繡、板面繪畫等五大類，其中又以前兩項收藏最豐。⁵⁵

手抄本

公爵共藏 300 冊手抄本，多於勃根地公爵 Philippe le Hardi 的 200 冊，少於查理五世的 1000 冊，而其妹伊莎貝拉在遠嫁米蘭維斯康帝家族(Gian Galeazzo Visconti)後，在帕維亞和米蘭兩地圖書館也藏有近千冊的手抄本，實屬罕見。對書籍和手抄本的狂熱收藏癖好，幾乎遍及當時所有法洛瓦王室，此傳統可遠溯至查理四世皇后 Jeanne d'Évreux。1325-28 年間，她向 Jean Pucelle 訂製《潔安黛芙

⁵⁴ Carla Lord, *Royal French Patronage of Art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Boston: G. K. Hall & Co. , 1985), p. 68.

⁵⁵ H. De Champeaux & P. Gauchery, *Les travaux d'art exécutés pour Jean de France, duc de Berry, avec une étude biographique sur les artists employés par ce prince*(Paris: Honoré Champion, 1894)

的日課經》(Heures de Jeanne d'Évreux,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修道院藏), 而貝利公爵的雙親則直接引領日後王室的藏書風潮。傑昂二世很早就開始購書, 並委託學者進行古籍翻譯。當他在 Poitiers 遭英軍擊潰, 隨身便攜帶《聖母神蹟》(Miracles de Notre-Dame), 連 1356-60 年囚禁期間, 依舊不改購書習性。盧森堡的波恩同樣委託 Pucelle 繪製《詩篇》(Psalter) (日內瓦 Bodmer Library 藏)。查理五世藏書量更甚先賢, 可謂法國皇家圖書館的創始人。⁵⁶

在瀾漫文藝氣息的家庭環境下, 貝利公爵自然承襲此藏書傳統, 甚至在書籍的多樣性與高品質上, 企圖超越查理五世。若以中世紀慣用宗教與世俗之分的標準來看, 公爵的遺產清冊中記載共 127 冊祈禱書, 數量最多, 也最精美, 分別為 14 冊聖經、16 冊詩篇、18 冊每日祈禱書(Breviary)、15 冊日課經、6 冊彌撒書、3 冊祈禱書、8 冊聖人傳記、3 冊福音書(Evangelaries)與書信體(Epistolaries)、4 冊聖葛瑞哥利講道與對話錄(homilies and dialogues of Gregory the Great)和近 30 冊其他類別的祈禱書。⁵⁷其中大部分為中世紀宗教圖書館常見書籍, 於 1404 年移送聖禮拜堂, 而日課經這類私人性十足的宗教書籍始終由公爵保管、使用。

就世俗體裁書籍而言, 公爵共藏有 41 冊編年史、38 冊騎士文學、24 冊藝術與科學類書、15 冊論政治和哲學類書⁵⁸。其中包括 Pliny、Suetonius、Begetius、Frontinus、Priscian 等羅馬作家論述、奧維德(Ovid)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和《論愛情》(Ars Amatoria)、維吉爾(Virgil)的《牧歌》(Bucolics)、兩本特倫斯(Terence)的《喜劇》(Comedies)、四本法文版的李維(Livy)著作, 甚至還有公爵自己和 Robinet 都無法閱讀的一本希臘古籍。⁵⁹他另藏有 Raoul de Presle 翻譯奧古斯丁的《天之城》(Cité de Dieu), 書中卷一的十幅細密畫上, 可見公爵簽名和藏書票(圖 3-24), 還有, Niccolo d'Oresme 翻譯的亞里斯多德《倫理學》(Ethics)、傑昂二世宮廷牧師 Gace de la Bigne 之《打獵的起源》(Déduits de la chasse)、

⁵⁶ Meiss, "The Library of Jean de Berry,"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the Patronage of the Duke*, p. 287.

⁵⁷ Meiss, *ibid.*, pp. 298-308.

⁵⁸ Meiss, *ibid.*, p. 307.

⁵⁹ Meiss, *ibid.*, p. 287.

Pierre Bersuire 翻譯 Livy 的《十年》(Décade, 卷二)。這些書籍不僅顯示貝利公爵深受細密畫的視覺美感所吸引，也顯示他對書籍內容的獨特偏好。

除了法文版的羅馬古籍外，公爵還長期贊助人文學者 Laurent de Premierfait 翻譯薄伽丘的著作。此外，公爵也長期贊助法國知名女作家 Christine de Pisan，她本身就是一薄伽丘迷。貝利公爵雖非首位開啟古書翻譯法文風潮之人，他始終大力支持，早在 1370 年，他就開始翻譯 Seneca 的《四美德之書》(Le livre des quatre vertus)，而自查理五世起開始翻譯的《馬西模思傳》(Valerius Maximus) 也是在他的資助下完成。

貝利公爵對藝術和文學作品的興趣不僅止於當代，還擴及十四世紀初期。他藏有 Jean Pucelle 的《潔安黛芙的日課經》、1326 年前為 Jeanne de Belleville 所繪《貝爾維每日祈禱書》(Belleville Breviary)、Gautier de Coincy 為皇后 Jeanne de Bourgogne 所繪《聖母神蹟》(Miracles de Notre-Dame)、傑昂二世的《傑昂聖經》(Bible de Jean de Sy)，以及原為查理五世所做《法國大事紀》(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 兩冊《聖經繪本》(Bible historiale)和一冊《每日祈禱書》。

珠寶與金工

貝利公爵名下共藏 33 件貴重寶石，相較於 1456 年麥迪奇家族 Piero de' Medici 所藏的 19 件，顯得異常驚人。他對貴重珠寶與雕刻寶石的狂熱甚至遠傳至義大利。Filarete 在《論建築》(Trattato dell' architettura)中，讚嘆公爵豐富收藏，他認為其鑑賞寶石功力超乎平常，已擴及圖畫文字學(glyptography)。⁶⁰ Filarete 甚至認為著名的奧古斯都寶石(Gemma Augustea)為公爵所藏。⁶¹

在西歐資本主義興起前，珠寶具有保值、融資的實用功能，可彰顯所有者的財富，更重要的是，它能隨時變現，償還債務。珠寶和金工的價值便反映在當時的語彙之中。Robient d' Etampes 以「珠寶」(joyau)一詞，泛指所有包含貴重金屬

⁶⁰ “.si loda ancora il duca di Berri della sua tanta dilectatione di questo cose.”引自 von Oettingen ed., *Trattato*, p. 659.

與礦石的物品，兼含宗教性或世俗性。這些物品有些塗以瓷漆或內含金屬，主要用於墨水瓶或祭壇畫。大部分都因過於珍貴，得適時變賣現金，無法留存至今。例如：1413年財產清冊中登錄一件尺寸最大的十字架，高3又1/2英尺，鑲有寶石和黃金雕像，包括公爵和公爵夫人像。然而1415年，公爵親自將它從庫藏中取出，卸除珠寶後鎔鑄成金，以支付戰爭所需軍餉。在《豐饒時節》的供奉十字架（f. 193r，圖3-25）中，畫家繪有類似1413年財產帳冊中所登錄的「蛇狀十字架」（croix au serpent）。基座和蜥蜴部分相符，但書中的蛇狀十字架是一面為十字架，另一面為聖母立於弦月上方。而畫中的十字架卻繫有一串硬幣或徽章，可能與基督教皇帝或奧古斯都預知拯救者終將降臨的意涵有關。另外，一月的金船(nef)，與財產帳冊中記載之「附有華蓋的鹽瓶」（salière du pavillon）相符，然文中記載「鹽瓶鑲有珠寶、外罩瓶蓋和天鵝圖樣的盾形徽章」的特徵並未出現在畫中。

再者，散發光澤的珠寶象徵著上帝之美，得引導信眾進入形而上的神秘冥思之中，各類寶石皆有其宗教意涵，常用來裝飾聖物。因此，中世紀的人並非單從精巧度和永恆性來欣賞寶石，而賦予它天體星空之魔力。⁶²有色雕刻寶石的字源為拉丁文“camaeus”或“camaï eu”，在中世紀專指有兩、三層不同色彩的浮雕寶石。古代僅出現一般泛稱寶石的「寶石」（gemma）或「雕刻圖樣」（imago ectypa）等詞彙，更能突顯中世紀特別強調有色雕刻寶石的主題和形式，他們以基督教義詮釋異教人物，海神波賽頓與女戰神雅典娜化身為亞當和夏娃。由於當時義大利與北方對古羅馬文物的需求大於供給，因此特定城市以生產古羅馬文物複製品為業。事實上，公爵收藏的寶石雖刻畫古典和中世紀主題，但原作與仿作交雜參半的情形卻相當普遍。以一刻有基督像的纏絲瑪瑙（圖3-26）為例，Wentzel 從其雕刻

⁶¹ “Dicesi che fu sua” 見 Meiss, *op. cit.*, p. 57.

⁶² 許多當時的銘文和文學作品，都曾記述此特質。例如：1367年法王查理五世贈與夏特教堂的朱彼特寶石，即刻有它能消災避難的文字。對基督教徒而言，《末代啟示錄》中清楚記載，有色雕刻寶石和凹雕寶石（intaglio）為上帝容光之表徵，故這些珠寶通常鑲在禮拜儀式所需聖物或墳墓裝飾上。見 Meiss, *ibid.*, p. 53.

風格和技術，判斷它應作於 13 世紀的義大利，極有可能是威尼斯，因當地沿襲早期基督教的圖像模式。⁶³

雖無確切文本證據，但現藏於大英博物館的兩件聖物和布魯日教堂中的黃瑪瑙聖杯應曾為貝利公爵藏品。其中之一，英法王室共有的聖杯（圖 3-27），鑲嵌透明朱紅、寶藍、金黃、暗褐及灰綠等多色寶石，金工技巧地將碧玉鑲在平淺凹槽中，以製造透明、細緻的色澤變化。從杯蓋上聖艾格尼斯(St. Agnes，查理五世的守護神)和握柄處兩條水平飾帶，一條印有都鐸王朝玫瑰家徽，一條印有銘文等線索可知，貝利公爵並非首位收藏家。聖杯的外型相當符合 1391 年公爵餽贈查理六世一件華美聖杯的文獻記載。另外一件，聖棘遺物箱(Reliquary of the Thorn，圖 3-28)約完成於 1400 年，印有貝利公爵家徽，與 Louis d'Orléans 有關，是現存聖遺物箱中結合金工、雕刻、珠寶和繪畫的完美例證。

貝利公爵所藏有色雕刻寶石多半鑲在珍珠、貴重或半貴重寶石上，即「珠寶」(joyaux)，其他寶石則鑲於聖遺物箱，特別是黃金十字架(croix aux camées)。雕刻寶石的年代與主題從古羅馬到基督教都有，據悉 1363 年，傑昂二世依據古代胸像，複製一凹雕寶石，作為其專屬印章。貝利公爵的女婿和友人也曾獻上一枚刻有公爵面部的戒指，今已軼失，僅存刻有 Jean sans Peur(圖 3-29)的類似作品。從許多再現公爵個人形象的細密畫中，可見公爵經常配戴兩只鑲有雕刻寶石的戒指，據悉他應另藏有五枚戒指。

徽章與硬幣

從 1402 年財產清冊可知，公爵藏有數十枚硬幣及徽章，其中部分為古代作品，而當時取得的古代或早期基督教物品中，計有四枚徽章與兩飾板。1413 年的財產清冊再度證實，1402 年公爵在布魯日向一位旅居巴黎的佛羅倫斯商人 Antoine Manchin(Mancini)，蒐購一件刻有君士坦丁大帝騎馬像的圓形金製徽章

⁶³ 關於法國中世紀珠寶與印章大量複製古代圖像，引 Wentzel, "Portrait 'à l' antique' on French Medieval Gems and Seals," *Warburg Journal*, vol. 16(1953), pp. 342-350. 見 Meiss, *ibid.*, p. 53.

（‘joyau d’ or roont’）。同一份財產清冊中登錄次物件為赫拉克里斯徽章，但未登錄購買日期和出售商姓名，推測為同一時間蒐購。接著，次兩件登錄物品為公爵委託複製黃金徽章的仿作，外型雖接近，卻未鑲飾珍珠、紅寶石和藍寶石，也未串金鍊以供懸掛。上述兩件原作和兩件仿作皆已軼失，但銀製或較不貴重的金屬複製品仍留存至今，與 Robinet 文中記載相去不遠，可供參酌。此外，文中還記載，在蒐購君士坦丁和大力士徽章前幾個月，公爵才向留居巴黎的一位佛羅倫斯人 Michiel de Paxi 購得刻有奧古斯都及提貝留士圖像的兩枚小型圓形金製珠寶（‘petit joyau d’ or roont’），尺寸小，裝飾也較不華麗，背面同樣有君王面相，⁶⁴ 帳冊中並未記錄複製品的存在。在 1416 年的遺產清冊中，後兩件估價僅為前兩件的二分之一。⁶⁵

上述四物件直徑約 9 公分，尺寸上較接近徽章，而非硬幣，由金工鑄模、塑造，製作方法接近早十年前義大利 Francesco Carrara 家族鑄造的徽章（圖 3-30）。1402 年財產清冊甚至明白表示，公爵借用卡拉拉家族「仿古」（all’ antica）概念，將自身胸像或頭像鑄成徽章。日後公爵又購得一凱撒銀製徽章（‘un grant denier d’ or bien pesant’），Robinet 登錄這枚徽章為古羅馬銀幣，並附註「此乃根據原作複製而成」（le visage contrefait au vif），刻意強調它與古硬幣的高度相似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四位君主皆為早期基督教史的關鍵人物，使得公爵的收藏顯得獨具意義。奧古斯都生於基督誕生之時；提貝留士生於基督過世之時；君士坦丁生於基督教會建立之時；赫拉克里斯生於十字架重新發現之時。

君士坦丁和赫拉克里斯對基督教的重要性，在刻文中清楚表述，尤其是後者（圖 1-4）。該徽章正面刻有赫拉克里斯胸像，他立於弦月上方、太陽萬丈光芒之下，右側寫著：「」（ILLUMINA VULTUM TUUM DEUS）；在傳統基督教圖像學中，月亮象徵「世間短暫、稍縱即逝」，另暗示君王征戰，故上下刻有「」（SUPER TENEBRAS NOSTRAS MILITABOR IN GENTIBUS）；徽章邊緣刻文以希臘文書

⁶⁴ Guiffrey, *Inventaire*, vol. 1, pp. 70-72 nos. 197, 198.

⁶⁵ 大徽章分別估價為 400 及 500 磅，兩件小徽章估價為 200 磅。見 Meiss, *op. cit.*, pp. 54-58.

寫「赫拉克里斯是為基督教君王」，但在 Robinet 的財產清冊中卻譯為：「在上帝神蹟下，赫拉克里斯為羅馬皇帝及仲裁者，永遠的勝利者。」(Eracle en Jhesu Christ Dieu, féal empereur et modérateur des Romains, victeur et triumpheateur toujours Auguste')。徽章背面描繪中世紀十字架傳說中的重要時刻，徽章上的希臘文，在財產清冊中轉譯為「在上帝榮光照耀下，君王破門而入，重拾神聖的十字架。」(Gloire soit es cieulx à Jhesu Crist Dieu qui a rompu les portes d'ender et rachaté la croix sainte, imperant Eracle')。相同主題與構圖也出現在蘭布兄弟的《美好時節》與《豐饒時節》月令系列。

相較之下，公爵早先購得的奧古斯都和提貝留士徽章，基督教意涵不甚鮮明。以前者為例，奧古斯都頭像上方的一行詩文：「MAGNU AB INTERGO SECULORUM NASCITUR ORDO」，語出維吉爾第四首田園詩(Eclogue)。這句話從奧古斯丁時代起，被理解為蒙受神寵的時代寓言。由於這四枚徽章曾短暫共存，故 Meiss 推測它們可能是公爵有計畫蒐購的結果，在特定慶典場合中使用。

公爵蒐藏這四枚徽章的用意，或許可從現存另一枚公爵收藏之徽章 聖母 (圖 3-31) 中略窺一二，它呈現聖母端坐在四位天使所形成的華蓋之中。1416 年遺產清冊中記載，此金製圓形珠寶為 1413 至 1416 年間，公爵向畫家 Michelet Saulmon 購得，徽章背面刻有貝利閣下(Monseigneur de Berry)肖像。聖母有四分之三全身高，文中記載為「一圖象」(‘un image’)，反面則記載「公爵手中持有一鍍金木板畫，高達公爵半身之長。」(‘un demi ymage, fait à la semblance de Monseigneur, tenant en sa main un tableau d'or’)。在這枚徽章中，貝利公爵與歷史中幾位基督教偉大皇帝並列，除了君士坦丁和赫拉克里斯外，尚有其他君主。

Roberto Weiss 認為君士坦丁和赫拉克里斯兩枚徽章上的勝利標語，出自拜占庭帝國的君王套詞。Weiss 甚至進一步推論，由於這種獨特用語並未在法國出現，故應為 1400-1402 年間，拜占庭帝國曼紐因二世(Emperor Manuel II)留居巴黎時，隨伺官員所提供。公爵甚至親自迎接曼紐因二世，邀他同遊布魯日，一起歡樂，觀賞其女瑪莉的婚禮。兩人交換手抄本與寶石、珠飾和織毯。曼紐因二世的

造訪確實引領法國宮廷內，近東文化與早期基督教的流行風尚，可能直接影響到貝利公爵的圖像計畫。而這些君王徽章便是在拜占庭人提供帝國標題的圖飾和套詞下，經由委託或自由創作的方式製成。對曼紐因二世而言，建立帝國首都的君士坦丁大帝，和發現十字架的赫拉克里斯最為重要，前者跨越東、西方，曼紐因二世可能將他視為尋求西歐協助的勝利象徵。⁶⁶

蒐藏品的文字：物的鑑賞語言

Robinet 的財產清冊，在文字的完整度和物件的多樣性上，在當時實無可比擬。與 1373 年查理五世委託貝利公爵圖書館員 Gilles Malet 彙編之手抄本目錄⁶⁷，及 15 世紀上半葉麥迪奇家族的財產清冊相較⁶⁸，更形豐富、完整。Meiss 推測 Robinet 可能以 1338 年登錄詳實的巴黎索邦大學圖書館目錄，為仿效典範。⁶⁹

Robinet 通常先記錄該物取得的出處和日期，當要取出藏品時，會在清冊邊緣附註上標示收受者的姓名，而非日期。例如：1412 年的財產清冊中就詳細記載，1401-1403 年間，公爵將名下部分珍貴藏品轉贈給聖禮拜堂，收受者為禮拜堂首位財產管理人 Arnoul Belin。此外，Robinet 多半會記述寶石雕刻的主題。諸如：布魯日首位大主教—St. Ursin 的聖遺物箱上為其雕像，主教斗蓬式長袍的鉤環鑲著一裸體男性的雕刻寶石。有些徽章刻有「薩哈辛頭像」(une teste de Sarrasin)、兩匹馬拉著一台兩輪戰車、異教神社或皇帝頭像等異教主題，有些則刻有聖告、主教頭像及聖母等基督教圖像。

登錄文字的長度與物品的昂貴程度並無直接關係，反而與其複雜和奇異程度有關。對於一些著名珠寶，Robinet 僅概略記錄，但對君士坦丁大帝、赫拉克里

⁶⁶ 引自 R. Weiss, "The Medieval Medallions of Constantine and Heraclius," *Numismatic Chronicle*, vol. 3(1963), pp. 129-144. 見 Meiss, *ibid.*, p. 57.

⁶⁷ Delisle, *Cabinet*, vol. 1(1868), p. 21. 法國皇家圖書館於 1380 年查理五世過世之時再度進行彙整。之後，1411 年 Malet 過世、1413 年，和 1424 年查理六世過世時皆陸續加以增訂。

⁶⁸ Piero de' Medici 在其父過世後，即 1456 年 1465 年間，陸續委託他人進行財產清冊之編製，但僅為概略分類說明。Lorenzo 也在 1492 年過世時進行財產登錄，但也是草草為之。在 Lorenzo 與 Piero 的第二份財產清冊中，每件物品皆清楚標示估價。對藝術史學者而言，1553 至 1568 年間麥迪奇家族的財產總冊(inventario generale della guardaroba)，資料並不如 Robinet 的豐富。

⁶⁹ Meiss, *op. cit.*, p.40. 引自 Delisle, *Cabinet*, vol. 2(1874), p. 142 及 vol. 3(1881), pp. 32f.

斯、提貝留士、奧古斯都等仿古徽章的相關文字與圖像記錄，卻記載十分詳細，甚至以法文轉譯徽章上的希臘或拉丁刻文。

Robinet 的財產清冊，其獨特之處在於登錄文字往往超出其材質和主題的描述，觸及製作技術和風格等問題。他通常會借用概念化的專有名詞，來表示特定地區生產的特定藝術作品。例如：關於文中的「倫巴底作品」(*Ouvraige de Lombardie*)一詞，20 世紀初的學者認為由於當時法國和義大利，特別是倫巴底地區，繪畫的發展密切關連，因此暗指具有義大利特質的法國繪畫。⁷⁰而後藝術史界則提出它指的是北義經卷畫。⁷¹

文中之「羅馬木板畫」(*Tableaux de l'ouvrage de Rome*)乃 1328 年購於巴黎。然而，1401 年 Nicolas Viaut 和 Arnoul Belin 首度登錄公爵財產清冊時，並未出現該詞彙。1412 年 5 月，Robinet 接手登錄工作時，以「英國作品」(*de l'ouvrage d'Angleterre*)記述曼紐因二世贈與之黃金與瑪瑙聖母像。此外，Robinet 以「希臘作品」(*ouvrage de Grèce*)一詞，概述曼紐因二世贈與公爵的十字架，日後同樣以「希臘作品」記述曼紐因二世贈與公爵的織毯。自此，類似詞彙偶爾會出現在財產清冊及 1416 年的遺產帳冊中。Robinet 用來記述聖母像的詞彙——「英國作品」也幾度用來形容名著名的『*opus anglicanum*』，這類織毯多半用在禮拜祭袍、祭壇正面。由此可知，Robinet 所用的專有名詞通常與特定地區生產的特定工藝品有關，並非侷限於同一類物品。帳冊中有兩座金製燭台記述為「德國製品」(*à la façon d'Allemagne*)、一頂毛帽(*houppelande*)記述為「匈牙利製品」(*à la façon de Hongrie*)。「威尼斯作品」(*Ouvraige de Venise*)則專指金工寶器，特別是玉髓和水晶等材質。然而，「希臘作品」卻同時可代表木板畫、珠寶和織品。

所有標示「佛羅倫斯作品」(*Ouvraige de Florence*)的物件皆為織毯，而帳冊中並未出現「西恩那作品」或「托斯坎尼畫作」。由此可知，Robinet 的分類主要

⁷⁰ Toesca, *Lombardia*(1912), p. 407. Bouchot, *Primitifs*(1904), pp. 196 ff; idem, 1905, pp. 18 ff.

⁷¹ M. Salmi, "Ouvraige de Lombardie," *Actes du XV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 Histoire de l' Art*(1952); A van Schendel, *Le dessin en Lombardie jusqu'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Brussels: 1938), pp. 49 f.

是根據材質和技術。由於當時特定地區或城市具有特定工藝技術，且貝利公爵收受遠地餽贈的地方工藝貢禮，諸如：君士坦丁、賽普勒斯、匈牙利、威尼斯和西班牙等地。由於西恩那和威尼斯未向公爵贈禮，且義大利各地繪畫技術和材質無明顯差異，可能因而造成 Robinet 以「佛羅倫斯作品」涵蓋各地的籠統說法。

Robinet 曾記述三幅細密畫為「倫巴底作品」，顯示當時確實有近乎地域風格的概念。就文體而言，Robinet 抱持的風格判斷基準更加明確。他提及羅馬賽尼加書信體(Epistles of Seneca)是用「倫巴底文體」(de lettre lombarde)所寫，這本書後來由米蘭公爵收藏。約 1400 年繪製的法國聖經(Bibl. nat. fr. 159)是以「法國文體」(de lettre françoise)寫成，而波隆那彌撒（現藏於慕尼黑國立圖書館）則屬「波隆那文體」(de lettre boulonnoise)。

就細密畫和繪畫而言，技術和材質並非主要的分類依據，使得 Robinet 的分類顯得含混籠統、可信度低。Robinet 所謂的羅馬作品與倫巴底作品可能來自羅馬和北義地區，但那不勒斯、托斯坎尼或波隆那之間的分野便不十分確定。這種分類也符合當時普遍以托斯坎尼或倫巴底來區分義大利南北各地的概念。

再者，Robinet 描述祭壇木板畫為「全新的」(tous neufs)，其他媒材畫作則以「古代的」(bien ancien)或「遠古的」(très ancien)來形容。例如：公爵暫居英國時所購買的手抄本，在財產清冊中記述為「羅馬製作的古詩篇」(très ancien Psautier ...ystorié d'ovrage romain)。然而，該書卻是英語寫成，年代最早為 11 世紀。Robinet 將羅馬式作品視同古羅馬的作法，不僅顯示公爵同樣重視仿古文物的價值，也反應當時仿古風潮之興盛，古物真假並非收藏的首要標準。

關於「古典」這個詞彙，Robinet 將多幅板面繪畫歸為「古法製造」(d'ancienne façon)，其中之一來自羅馬，另一件則是賽普勒斯皇后餽贈公爵之禮。其他標示為古典的作品出處相當模糊，卻不具古典特質，例如兩個飾有拉丁文卷軸的金杯。顯然地，Robinet 所謂的「古典」並非指古希臘羅馬的文明產物，反而是較接近古典的文物，在財產帳冊中未加以歸類，例如：文中記載一枚凱撒大帝徽章是依照原作複製而成(contrefait au vif)，未被歸為古典作品。還有，部分有色雕刻

寶石確實為古典作品，但幾乎皆未歸類為古典。

貝利公爵的財產帳冊在數量及特性上皆屬異數，文中所涉及的概念，至今尚未有專人研究。或許在當時，這些概念普遍存在於公爵的交遊圈中，有些概念可能通行於其他地區。Meiss 的初步研究僅為這類討論的開端，若能對 14、15 世紀的專業用語進行全面性研究，或許有助於釐清財產清冊的文化意涵。從上述分析可初步判斷，Robinet 登錄藏品的分類方式雖不全然真確，卻是充滿現代博物館的經營理念，具有時間和歷史感。此外，Robinet 混淆古典與中世紀羅馬式的作法，顯示出 15 世紀初的法國，異教古典文明的概念在文學中較清楚，在視覺藝術中不甚明確。

蒐藏品的流動：物的商品價值

在公爵的龐大收藏中，有 350 件為他人獻呈或餽贈，其中又有 177 件珠寶和 80 件手抄本為新年賀禮。依據法國王室習俗，新年當天，公爵會和家人、王室成員，包括藝術家、官吏、本國與外國使節和教會高階教士等人，交換新年禮物。據估計，公爵共送回 231 件禮物，其中有許多還是他人贈禮。因此，在多份財產帳冊中，登錄物件經常會有增減變化。⁷²

財富充裕的王族多半贈送金工或珠寶等貴重賀禮。查理六世就送他許多珍貴寶石和手抄本，包括價值連城的淡色紅寶石(balais)。這顆寶石價值 1800 金幣(écus)，法王以 400 金幣的價格賣給貝利公爵，其餘 1400 金幣分三期，從 1402-1404 年的新年賀禮中抵帳，顯示新年賀禮還具有資金融通的功能。當時珠寶、金工、精美經卷畫常成為解除財務吃緊的融資工具，特別是由貴重金屬製成的物品，以致於這些珍品至今極少流傳下來。儘管貝利公爵與勃根地王室競爭激烈，但兩方依舊定期贈禮，甚至連 Jean sans Peur 繼位後，雙方政爭雖日益白熱化，但贈禮習俗未曾間斷。⁷³有時，贈禮實出自政治目的，如 1412 年 5 月，公爵在勃根地

⁷² 見 Meiss, *ibid.*, pp. 48-50.

⁷³ Meiss, *ibid.*, p. 49. Philippe le Hardi 多半餽贈公爵珠寶和聖安德魯黃金雕像，有時贈送板面繪畫

派和阿碼尼亞克派交惡之際，贈與 Jean sans Peur 一紅寶石，安撫敵方。許多重要官員和國政顧問也以禮相贈，以博得公爵歡心。像是 Louis de Sancerre 甚至將母親的寶石切割一半送給公爵，而 Marshal Boucicaut 送他君士坦丁大帝遺物和毒蛇解藥。夏特主教 Martin Gouge 送他聖路易曾擁有的金製大水罐。

相較之下，家臣多半贈送較樸素的器皿或手抄本，書籍流動因而頻繁。王室之間手抄本交流的習慣，可從書頁上蓋有書記 Jean Flamel 為貝利公爵特製的藏書票得到證實。1402 年財產清冊中記載著一部細字書寫(lettre boulonnoise)、裝飾華美的聖經，這本聖經和現藏於梵諦岡的聖經一樣，都印有教宗和公爵的標記，公爵贈與 Louis d'Orléans，1407 年遭謀殺後又再度取回。除了王室成員外，教會人士也以書相贈。1394 年起，公爵和布列日主教 Lubert Hautschild 相交甚密，1403 年主教贈與公爵一冊占星手抄本，顯示兩人關係異常緊密。布魯日大主教 Guillaume Boistratier 與夏特教堂主教 Martin Gouge 也都贈書敬賀，公爵則回贈夏特主教一件大型織錦祭壇座。

學者和作家通常也是以書為禮。公爵秘書 Gontier Col 曾致贈一尺寸極大、刻畫精美的世界地圖('une bien grant mappamonde, bien historiée')，捲放在長形木盒中。法王顧問 Pierre Salmon 贈與一冊繪製精美的《上帝之城》(Cité de Dieu)。公爵的外科醫師 Simon Alegret 送他《保健手扎》(Tacuinum Sanitatis)。女作家 Christine de Pisan 與公爵的關係也超乎尋常，她每完成一部作品，便獻呈諸位王室成員，是法洛瓦王室重要的贊助作家。自 1403 年起，1404 年、1405 年、1410 年、1413 年及 1414 年，貝利公爵陸續收到她的作品。Robinet 特別記載其中兩件，公爵則以現金或其他等值物品，做為報酬。就當時手抄本的製作而言，作者及翻譯者有寄送成書，以供贊助者保存的權利。手抄繪師雖同屬製書的專業師傅，但他們應先提供贊助者一樣本，不得自行製作手抄本，以禮相贈。因此，1411 年，保羅及其兄弟贈與公爵一部偽書的事件便顯得十分有趣。Robinet 在 1413 年

和精美手抄本，例如 1403 年 Philippe le Hardi 贈送一冊《歷史之華》(fleurs des histoires)，1407 年 Jean sans Peur 回贈一本繪製精美的聖經。

的財產清冊中仔細記載：「一本複製木製封面的偽書，描繪十分逼真，但內頁卻沒寫任何文字。」⁷⁴這份賀禮一是開其職業的玩笑，二來刻意彰顯他們寫實、精湛的描繪功力。

上述藏品在公爵的交流圈內，以餽贈的方式交換、流動，其原意或為拉攏關係，或為償還債務，或為政治協商，形成一緊密、封閉的社群網絡。這種類似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猶未脫離封建西歐的自然經濟模式。商品以餽贈或竊奪的方式流通，尤其是菁英階級更藉由這兩種基本方式移轉物產。餽贈的目的在於建立雙方友好關係，禮物反淪為附屬品；竊奪則足以動搖被奪者的榮譽與地位。兩者皆暗示贈與者與收受者的上下、附屬關係，即社會位階的高低關係。⁷⁵就貝利公爵的收藏脈絡而言，其本質也不外乎如此。透過贈與和獻呈的行為，建立雙方的個人關係，形成所謂的同胞愛(amici)，不斷強化貝利公爵在其贊助網絡內的中心地位。有趣的是，財產清冊中，部分藏品還是經由貨幣，或是等值的寶石、屋舍、甚至貴族頭銜等有價物，交易購得。相較於之前的餽贈或竊奪，這種近乎貨幣交易的形式，顯示雙方非敵非友，處於中性的關係，無高低位階之別。貝利公爵收藏管道的多樣性，除了反應他自身對奢侈品有過人的需求和喜好外，也突顯 14、15 世紀的法國在經濟與文化上與其他諸國來往密切的現象。

⁷⁴ “un livre contrefait d’ une pièce de bois paincte en semblance d’ un livre où il n’ a nuls fueilletts ne rien escript” 引自 Guiffrey, *Inventaire*, vol. 1, no. 994.

⁷⁵ Patrick Geary, “Sacred commodities: the circulation of medieval relics,”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N. 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69-194. 相關論述可參酌 Chris A. Gregory, *Gifts and Commodities* (London: 1982); Philip Gerison, “Commerce in the Dark Ages: A Critique of the Evid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er. 6, vol. 9(1959), pp. 123-40; Georges Duby,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N. Y.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74)

第三節 關於貝利公爵的文化品味

自 1380 年起，貝利公爵就開始積極建立專屬圖書館，其中包羅不同種類與風格的藏品，多樣性與新鮮感是不容忽視的取決標準，顯示公爵有極大的求知慾與包容心。公爵幾乎與各門類的頂尖藝術家都有合作經驗，當圖書館初建之時，他陸續網羅當時法國都市極為風行的三種藝術風格，領導王室手抄本收藏的流行風尚，依序為 Jean Bondol 工作坊的「波圭多風格」(Boqueteaux Style)、雕刻家 Beauneveu，即畫家 Parement Master 的「帕赫蒙風格」(Parement Style)，以及 Jacquemart de Hesdin 工作坊承襲 Pucelle 傳統的「賀斯登風格」(Hesdin Style)。為使藏書更為豐富，公爵又向二流畫家求畫，如：冒名的賈葛馬 (Pseudo-Jacquemart)、畫風傾向保守的聖母畫師(the Virgin Master)，以及風格大膽、華麗的(Luçon Matsier)。⁷⁶儘管館藏並非全為精品，但數量與種類的豐富度始終是公爵一貫的收藏方向，套一句 Jules Guiffrey 的話，貝利公爵的圖書館企圖呈現百科全書般的時代知識。⁷⁷

和查理五世的圖書館相比，貝利公爵不僅喜歡閱讀文字，顯然更講究視覺。前者圖書館中，手抄繪本風格相當一致，應屬 1380 年左右的「波圭多風格」。⁷⁸此外，查理五世對其藏書感到自滿，他熱愛閱讀，常以學生謙稱，伴隨巴黎大學學者討論文學典故。他對各類知識皆抱持興趣，特別關心統治者理當熟悉的法律、歷史、政治和道德等學科，長期委託學者將原書由拉丁文翻成法文。

儘管公爵的品味廣泛，但也有特別偏愛的文化傾向。以 1400 年初，法國王室間流行的法蘭德斯細密畫風格為例。當時，公爵的交遊圈立即提供相關繪本，而公爵也曾購買一、兩件類似作品，並於 1405 年委託一位法蘭德斯畫家和其助手，接續未完成的《聖母院美好時節》。在這波法蘭德斯流行風中，Bedford Master

⁷⁶ Meiss, "The Duke's Tast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the Patronage of the Duke*, p. 298.

⁷⁷ "présentait comme une encyclopédie résumée des connaissances de son temps" 引自 Guiffrey, *Inventaire*, vol. 1, p. 142.

⁷⁸ Meiss, *ibid.*, p. 299.

為公爵繪製 貝利公爵其隨從在聖彼得陪同下步入天堂 (圖 3-15),但 1408-1410 年間,他僅委託該工作坊繪製《大日課經》及《布魯日經》(Lectionary in Bourges), 日後更少有贊助,顯示公爵對其風格的興趣日漸消退。

同時,公爵也蒐藏淑女之城畫師(Master of the Cité des Dames)繪製、Christine de Pisan 撰寫的《淑女之城》(Cité des Dames)。儘管該畫家在當時並非數一數二,作品呈現秩序、幾何與宏偉的美感。此外,公爵還藏有同樣由 Pisan 所寫、使徒書畫師(Master of Épître d'Othéa)繪製之《命運之變》(Mutacion de Fortune)。使徒書畫師是 1400 年左右巴黎相當神秘的細密畫家,在《命運女神》(Atropos)一畫中,人物纖細,構圖奇巧,筆觸流暢、恣意,色彩輕柔、明亮,接近北義倫巴底,特別是 Giovannino dei Grassi 的風格。使徒書畫師引領當時巴黎、倫巴底和尼德蘭細密畫的色彩流行,偏愛高明度及白色、灰白、灰褐與紅色相間的色彩表現,細緻而複雜。1414-1409 年編纂的《克利絲丁皮贊作品集》(Œuvres of Christine de Pisan)中有幾幅細密畫也是由巴黎畫師 Egerton Master 所繪製。⁷⁹

公爵所藏的當代細密畫,多半為法國或法蘭德斯畫家所做。雖然他年輕時暫居英國,但英國細密畫的影響卻不明顯。由公爵蒐藏各具法蘭德斯、義大利與法國地域風格的作品脈絡來看,他在尋找不同的風格表現,而這些為他服務的藝術家,其作品方能完整地呈現貝利公爵自己。

從公爵所收藏的眾多義大利繪畫和手抄繪本,以及他雇用來自米蘭的書記 Pierre de Vérone 為圖書館員一事可見⁸⁰,公爵與義大利藝術關係密切。然而,他並未直接引進義大利藝術家,或是親身訪義,反而較偏愛由托斯坎尼及倫巴底風格轉化過的法國藝術,色彩輕巧、明亮,畫面空間開闊,靜默、抑制的戲劇感。十四世紀的義大利繪畫顯得相當穩定、清晰、無裝飾性,沒有溫暖、歡愉和擁擠的風景,這些氣氛反而是由公爵贊助的畫家所營造出來的。公爵對義大利繪畫的興趣在當時並非個案。早在 1373 年,勃根地公爵的宮廷畫家 Jean d'Arbois 就到

⁷⁹ 關於貝利公爵委託繪製之手抄本風格轉變,見 Meiss, *ibid.*, pp. 3-13.

⁸⁰ Meiss, "Pierre de Vérone," *ibid.*, pp. 63-67.

過義大利學習，故其後學 Jean de Beaumetz、Jean Malouel 應當以義大利 14 世紀繪畫為習作範本，對蘭布兄弟的創作勢必有不小的直接影響。

當義大利 14 世紀畫風在公爵宮廷內流傳之際，一些人文學者也從事義大利 14 世紀文學著作的研究。其中和公爵關係密切者有四位，分別為擔任公爵秘書的 Gontier Col、Jean de Montreuil，以及十分推崇薄伽丘和佩托拉克的 Pierre Col 和 Nicolas de Clamanges。但是，他們仍堅持 12 世紀起屬於法國本身的古典學術傳統，強調從希臘、羅馬，傳至法國的學術傳承(*translatio studii*)。他們反對佩托拉克所言教皇權重建於羅馬的說法，一位巴黎大學法學專家，在擔任查理五世大使時，向教宗宣稱：「羅馬光榮已轉移至巴黎的高盧人！」。⁸¹對於古典學術，法國人文學者起初是從道德的觀點來看，但漸漸地卻為古典的風格所吸引，他們的認知多少會左右貝利公爵的贊助活動，例如維吉爾的《牧歌》、特倫斯的《喜劇》，以及大量的法文版羅馬古籍與當代著作。

若從這個角度，或許可理解公爵大量藏品中的仿古(*all antica*)概念。在中世紀一直保有對古錢幣和徽章的興趣，但要到佩托拉克和 Lombardo della Seta 才開始以偉大、消逝古文明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古物。他深諳並非所有羅馬或拜占庭樣式的收藏都是該時期的真品。在五枚印有羅馬皇帝的徽章中，僅有凱撒大帝那枚為依真品複製的古羅馬銀幣(*denarius*)。對於能懷想藉由這些仿古徽章懷想先賢偉績，公爵甚為欣喜，並未刻意區分古代原作和當代複製品，顯示仿古本身在宗教、歷史及美學的價值甚於其真實性。前兩者屬傳統價值，蒐購歷史名人徽章的計畫與比塞特城堡內所規劃的名人肖像陳列室，有異曲同工之妙，首重其象徵意義與政治需求。而公爵對於精巧、纖細的美感品味便反映在大量裝飾華美的珠寶與手抄本之中，顯示出公爵出自北方的鑑賞品味。這種品味可以 1405 年 Pisan 針對貝利公爵的圖書館藏，概略地進行中肯的評價為例：「這位王子性情十分純良，為他服務的人皆知他特別喜好細緻、精巧、明晰、華美的書籍。它們多半為

⁸¹ “haec gloria Romanorum Parisius in Gallos est translata”引自 Simone, *Coscienza*(1949), pp. 54 f.

道德學、政治與歷史故事和值得讚頌的道德教訓，由法國和巴黎的工作坊畫師，以華麗、炫目的裝飾物，細緻地描繪、添飾。」⁸²從一位女性學者的角度，Pisan的這段文字寫出貝利公爵的贊助活動兼顧道德教育和世俗美感的兩種層面，也隱約透露出他身為一位王室贊助者的社會需求與文化品味。

⁸² “.il est prince de grande b nignit  envers tous ceux qui ont   lui parler. .moult est d bonnaire   ses serviteurs, les aime et porte, et enrichist, par especial, ceulx don’ t a singuli re oppinion, ou a trouv  bons. Se d licte et aime gens soubtilz, soyent clerks, ou autres, beaulx livres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historire notables des pollicies rommaines, ou d’ autres louables enseignemens; moult aime et volentiers en oit, tous ouvrages soubtilment fais et par maistrise beauls et polis, aornemens riches, beauls  dfices don’ t a fait faire maint en son pays,   Paris, et alieurs ...” 引自 Michaut & Poujoulat, eds., *Livre des fais et bonnes meurs du sage roy Charles*, pp. 17 f. 見 Meiss, *ibid.*, p. 308.